

热点聚焦

对长三角全域一体推进现代化的思考

洪银兴

向后发展地区，进而推动长三角全域一体实现现代化。

“四化”同步推进的现代化：

后发展地区的现代化跨越

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这“四化”是一个有机协同、相互支持的系统，需要坚持“四化”同步推进。对先发展地区和后发展地区来说，“四化”目标是一致的，但进程各不一样。在推进“四化”中要符合客观规律、承认差异，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和推进。

一是新型工业化。对一些先发展地区来说，原来意义的降低农业比重、提高工业比重的任务目前已大致完成。比如，长三角的一些先发展地区农业比重已经降到很低，工业比重则比较高。为了给服务业发展留出更大的空间，其工业化就不能一味地进一步提高工业比重，而是要在制造业比重多年下降的基础上稳定制造业比重。其新型工业化的内容应定位在“新型”上，更多转向工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尤其是在实现“双碳”目标上走在全国前面。对长三角的一些后发展地区来说，则需要补工业化的课。现有一些后发展地区基本上是农业地区，工业发展尚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其服务业比重也不高，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需要提高工业尤其是现代工业的比重。

二是城镇化。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长三角一些先发展地区已经超过了80%。要看到的是，现代化要求的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不仅要求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还要留守在农村的农民享受相应平等的权利。但在长三角一些后发展地区，城镇化率还不是太高。对城镇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农民进城，城镇化的发展意义在于集聚发展要素。对于一些后发展地区而言，其经济落后的原因与城市小而小、城市功能弱、集聚不了发展要素有一定关系。因此，要增强其集聚要素和人才的能力，就要补城镇化的课，推进城市和乡镇的现代化。

三是农业现代化。长三角一些先发展地区的农业比重已经比较低，但对农业比重较高的一些后发展地区来说，推进农业现代化意义非常重大。新时代推进农业现代化，关键是改变农业发展方式，不能停留在过去提供剩余农产品和剩余劳动力的范式上，而是要转向提升品质和附加值的发展范式，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对农产品品质需要的同时，提高农

业附加值，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四是信息化。在新发展阶段强调推进信息化，不仅要求信息产业本身达到国际前沿水平，而且还要为各个产业提供高级化的信息化基础，也就是信息化为其他“三化”赋能。长三角一些后发展地区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要在信息化上实现跨越，瞄准前沿信息技术，发展现代信息产业。

概括起来，长三角全域一体推进现代化，重点在一些后发展地区。对于这些地区来说，不仅要明确新发展阶段同步推进的“四化”目标，还要明确其发展的短板和重点所在，要以工业化引领，坚持信息化赋能，补齐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短板，力争与先发展地区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

融入新发展格局：

实现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循环

长三角覆盖区域约占国土面积4%，经济总量却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具有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和市场潜力大等诸多优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如何发挥重要的窗口和示范作用，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其突破口就在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全域经济的一体化循环。

对长三角一些先发展地区来说，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比较高，有了自我持续发展的能力，具有内生发展的资源和动力，只要放开其手脚，完全有能力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对长三角一些后发展地区来说，其现代化还缺乏内生的资源和动力，比如，缺乏创新要素、人才不足、基础设施落后、难以吸引和集聚发展的要素等。这些地区还需要继续补齐短板，找准重点发力，朝着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不断努力。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区域带动和示范作用。中央强调，要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所谓彰显优势，不仅仅是指彰显先发展地区的先发优势，还需要彰显区域一体化的优势。所谓协调联动，就是要求先发展地区与后发展地区在现代化上协调联动，也就是一体化联动。

对长三角一些先发展地区来说，与后发展地区一体化联动有自身发展的要求。一体化联动路径主要包括：一是产业一体化。先发展地区可考虑把新项目（主要是制造业项目）落到后发展地区，把企业建在后发展地区，把产业链延伸到

后发展地区，形成一体化的产业体系。二是创新一体化。高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在空间上可以分开。先发展地区和后发展地区可以共同形成创新一体化新高地。三是交通信息基础设施的一体化。长三角一些后发展地区发展相对落后，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设施和信息化设施）较为落后有关，难以获得中心发展要素的辐射带动作用。因此，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中，要重点规划和建设后发展地区的现代交通信息设施，补齐其获取发展要素和信息流动的短板。

四是优化“双飞地经济”。一些先发展地区可以到后发展地区建各类工业园区等，一些后发展地区也可以到先发展地区建研发机构，利用先发展地区的科技力量和人才，研发自身所需要的可以实现产业化的新技术。

在一体化中推动区域同步现代化，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一方面，要用好“市场的手”，尊重发展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用好“政府的手”，对区域内的要素流动和合作给予政策支持。特别是改革发展的政策应更多考虑后发展地区，增强其自我发展的能力。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

其一，长三角全域一体实现现代化，重点在后发展地区、难点也在后发展地区。有必要调整政策思路，加大对长三角一些后发展地区的政策支持。比如，可考虑在后发展地区建立“四化”同步示范区等，助力后发展地区实现现代化。

其二，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不均衡是客观存在的，如城市和乡村、平原和山区、产业发展区和生态保护区之间的差异，不能简单、机械地理解均衡性。考虑到后发展地区现代化对长三角全域一体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相关政策安排应该从实际出发，根据后发展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实现现代化的需要来确定其相应的限制性指标，为其提供一定的发展空间。

其三，长三角区域各级政府需要根据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科学评价和考核各地发展情况。要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提高政策协同性，特别是要对各地的GDP统计、税收政策、人才政策等作出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从而有利于打破行政壁垒，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实现更合理分工，凝聚更强大的合力。

其四，长三角一些后发展地区要克服“等、靠、要”思维，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市场化思维，把重点放在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上，更好吸引和凝聚发展要素，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

总之，上述一体推动全域现代化的路径和相应的政策创新，彰显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优势，是长三角高质量实现现代化的可靠保障。长三角全域一体推进现代化不是一日之功，我们既要有历史耐心，又要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既谋划长远，又在于当下，要从实际出发，理性谋划、科学推进，不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

以更高层次沿边开发开放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杨长湧 原倩

进入新发展阶段，沿边开发开放要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有新定位新使命，要在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强安全发展能力等方面下功夫，从而更好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长期以来，沿边开发开放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在加快沿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稳边固边兴边方面取得重要成就。新时代呼唤更高层次的沿边开发开放。沿边开发开放要更好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窗口、共享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安全发展的重要示范。

（一）

沿边开发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沿边开发开放的一系列政策举措，设立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促进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跨境旅游合作区等平台高质量发展，推动沿边地区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局。2020年，沿边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较2012年大幅增长，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明显提升。同时，在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下，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合作交流取得一系列成果，在互联互通、投资贸易、口岸通关、文化旅游、科教文卫、边境管理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日益深入，在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方面迈出坚实步伐。

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既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要尊重经济规律、尊重实际，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形成区域间彼此协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整体发展新优势。沿边开发开放要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有新定位新使命，以更好激发高质量发展潜力。

沿边地区要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窗口。沿边开发开放虽然成绩显著，但整体水平仍有待提高，一些沿边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以及内陆开放新高地的发展差距仍然较为明显。一个重要原因是沿边地区处于国内市场相对“末梢”的位置，来自国内大市场的供需两端支撑都有待提高，扩大对外贸易和双向投资合作的能力受到一定制约。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沿边地区要推动开发开放大跨越，必须紧密联结国内大市场，发挥“边”的区位优势，背靠国内大市场吸引集聚优质要素和资源，实现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窗口”的转变，更好地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为国际经济合作开辟更大空间。

沿边地区要成为共享发展的重要抓手。新发展阶段要更加重视沿边地区这个薄弱环节，缩小沿边市县与本省（区）内经济高地、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这是新发展格局下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沿边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也

是睦邻安邻富邻、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沿边地区要以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契机，大力改善基础设施，大力推动产业发展，大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构建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协调共进、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优化互促的良性循环，不断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活力。

沿边地区要成为安全发展的重要示范。当今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沿边地区安全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包括霸权主义国家的挑衅增多、周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等。沿边地区要适应安全发展新形势，探索统筹发展和安全新路径，形成安全发展的良好示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协同并行，打造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新样板，打造社会治安管理保障新高地，打造新发展格局下沿边地区安全发展新局面。

（二）

新发展阶段对沿边开发开放提出了新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扎实推进沿边开发开放，从而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一是改善沿边交通基础设施。“道路通，百业兴”。要推动沿边地区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是第一位的。一方面，要推动沿边地区全面融入国家铁路网和公路网，加强同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以及长江经济带等重要物流大通道的对接联系，实现沿边地区与国内大市场货物和人员物流无阻。同时，重视航空运输对沿边地区发展的带动作用，支持边境城市合理发展支线机场和通用机场，推进边境城市机场改扩建，增加国内主要城市与沿边旅游目的地城市间的直飞航线航班。另一方面，应积极发挥丝路基金等的作用，加快推进我国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动沿边地区进一步融入泛亚铁路等国际运输网络，促进跨境商品和要素流动。

二是提升沿边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缩小发展差距、改善民生福祉，关键要发展产业，特别要发展能够吸纳大量就业人口、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制造业。当前，多数沿边地区面临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难题。应进一步实施差异化产业政策，配套实施投资、土地、用工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在沿边重点地区优先布局进口商品加工转化利用项目和进口资源落地加工项目，发展开放型产业集群，夯实共享发展的重要基础。应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制造业紧密结合，增强沿边地区制造业融入国内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能力。应强化沿海发达地区与沿边市县的对口产业帮扶与合作机制，鼓励沿海优质要素和产业辐射带动沿边发展。应积极推动沿边地区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跨境电商等，支持边境小额贸易向综合性多元化贸易转变。

三是增强沿边地区的安全发展能力。应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既有效用好发展成果夯实沿边地区维护安全的物质基础，又积极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沿边安全环境，防范化解涉及国家安全的各类风险，不断提高沿边地区社会治理水平，确保边疆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幸福。应积极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与周边国家分享防控救治资源和经验，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全局的高度和更长远的考虑来认识和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增强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下更大气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京津冀区域合计人口规模超1亿人，内需潜力巨大，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桥梁。同时，作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应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好关键作用。立足新发展阶段，京津冀要进一步找准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位置，充分发挥区域市场优势、创新优势等，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助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是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融入国内大循环。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建设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利于京津冀地区更好融入国内大循环，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要优化营商环境，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不断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要加快区域交通一体化建设，发挥京津城市规模优势，为巩固提升区域大市场提供强力支撑；要进一步推动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加强统一征信体系建设和金融信息共享合作；要推进区域旅游市场一体化建设，整合三地旅游资源，促进旅游标准化建设，共同打造京津冀旅游品牌；要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商贸流通体系，打造区域公共物流信息服务平台，构建便利、高效、统一的商品通关业务模式和便捷、高效的大通关服务体系。

二是强化示范带动，打造开放窗口。开放合作仍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京津冀应加快打造对外开放窗口，激发海空口岸的协同发展潜力，发挥示范带动效应，为形成可持续的国际经济循环体系提供有力支撑。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技术、品牌、服务等水平，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与此同时，还要加快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特色化消费新地标和新型消费圈，挖掘文旅消费潜力；全力打造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加快建设绿色一流的世界级枢纽港口，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点；推动京津冀机场一体化管理，打造世界级机场群，建设空港型国际消费枢纽。

三是强化科技支撑，打通痛点堵点。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只有加快推动科技自主创新，打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补齐补强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巩固完善创新链条，才能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打造和巩固国际竞争新优势。北京应充分发挥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作用，着力提高原始创新和技术服务能力，促进京津冀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围绕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

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

优势与津冀之间产业资源优势的有效互补和深度融合；三省市应结合自身定位，瞄准高端环节和高端业态，聚焦比较优势产业，不断提升产业集群的规模和质量，打造立足京津冀、辐射全国的“高精尖”产业策源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的创新底气和信心。

四是补齐民生短板，持续激发内需潜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就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京津冀三省市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等方面下大功夫，这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所在，有助于持续激发内需潜力，做大区域市场，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为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提供发展保障。在这一过程中，要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减轻家庭在住房、教育、育幼、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负担；加快京津冀城乡融合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优化城镇布局结构，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

五是发展服务贸易，塑造发展新动能。要依托自贸区建设，推进三省市跨区域检验检查和通关一体化，提高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为京津冀打造更高层次的开放平台提供支撑。要结合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有序放宽市场准入，有效改革监管模式，推动服务业发展与国际接轨，提升区域内服务贸易的辐射带动能力。与此同时，还要结合中国（北京）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营造高效、便利的营商环境，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服务外包、中介服务等新兴贸易业态，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六是推进产业协作，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应聚焦国家赋予京津冀的重大使命，结合区域产业优势和特点，按照资源互惠、政策互惠、功能互补、融合互动的原则，推动京津冀三地理顺产业发展链条，促进三省市产业有序转移承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打造立足区域、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优势产业集聚区。一方面，要加强京津冀在科研成果转化、技术转让、企业孵化等方面的合作，共建一批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和产业承接平台，集中承接北京产业转移项目和产业链对接项目；另一方面，要重点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高端装备等产业，打造京津冀三地互融耦合的产业生态链，推进区域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和产业布局优化，联手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京津冀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提供重要保障。

（执笔：王少国 孙哲）

本版编辑 欧阳阳